

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形成背景分析

——关于考古学文化空间分布特殊模式的思考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 商文化 京当类型 形成背景

摘要: 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渭河流域、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京当类型与先周文化在时间维度上是并行关系,且两者的空间分布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其中京当类型呈据点式分布,在考古学文化层面,它是一种特殊分布模式。本文还对这种特殊分布模式的形成背景作了探讨。

KEY WORDS: Shang Culture, Jingdang Type, Formation

ABSTRACT: The Jingdang type is a regional version of the Shang Culture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Guanzhong Basin in Shaanxi. The present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is regional type also indicate that the Shang Dynasty pushed its territory toward the Wei River Valley. Nonetheless, the Jingdang type is also a hybrid of the Shang culture with indigenous cultures. The Jingdang type was contemporary with the Proto-Zhou culture and overlapped with the later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Jingdang type were distributed sporadically.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very distinctiv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of this spec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商文化的京当类型是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渭河流域、融合本土族群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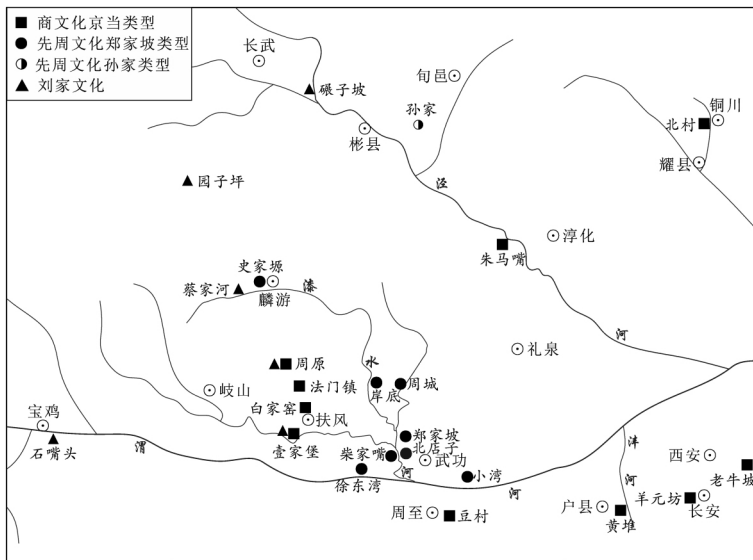
京当类型最初是邹衡先生提出来的^[1],当时主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陕西岐山县京当和扶风县美阳采集的青铜器^[2]、扶风县白家窑采集的陶器^[3],由于这些采集资料非常有限,因而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随着关中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相继发掘了几处商文化或含商文化的遗址,如耀县北村^[4]、扶风壹家堡^[5]、西安老牛坡^[6]等,大致在此前后,关中西部一些本土文化遗址如武功县郑家坡^[7]、扶风县刘家^[8]和长武县碾子坡^[9]等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包括京当类型在内的关中西部商代文化作了新的探讨。如有的学者认为将关中西部商文化遗存称为京当类型并不合适,所以称之为“北村类型”^[10];有的学者则认为叫“老牛坡类型”更合适^[11];还有学者认为壹家堡第一期属于先周文

化而非商文化^[12]。1995年礼泉县朱马嘴遗址的发掘^[13],商文化遗存比以往发现的关中西部其他遗址更为丰富,为界定关中西部商文化确立了明确的标尺,由此使“京当类型”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1996~1997年对与京当临近的王家嘴遗址进行了发掘^[14],2001年周原考古队又在王家嘴^[15]、2004年在老堡子^[16]等地点作了发掘,使京当类型商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清晰。

现在,京当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在空间分布上有怎样的特点,与先周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的思绪,其中与先周文化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的特点引人深思。本文试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纠葛

学界有关京当类型的讨论中,总会涉及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时空关系,并存在不同认识。



图一 关中西部商时期遗址分布示意图(殷墟一期前后)

一说认为两者是前后相继的关系。邹衡先生在有关早商文化类型的研究中,认为京当类型遗存的年代大都属于早商文化第三、四段^[17],即郑州二里岗上层到殷墟一期之间。“由于以上商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现,至少说明先周文化并不是从来就在泾渭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很有可能,商周(或先周文化第一期以前的其他文化)两种文化在此区域内,经过较长时期的相互争夺,最后,先周文化才完全代替了商文化的地位。”^[18]由于京当类型的遗址最西分布到关中西部的周原南北一线,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位于其以东地带,因而给人以两个文化在空间分布上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在时间上必然不能同时存在的印象。正是基于这种思路,邹衡先生在《再论先周文化》中认为郑家坡遗存的年代上限在商王祖甲以后^[19]。据考古调查和发掘^[20],郑家坡这类遗址在周原以东的漆水河流域有比较多的地点,因而更强化了这种认识。所以有学者说,令人难以相信,同一区域内(范围不大)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敌对的)能够安然相处百余年之久仍然保持各自原有的特征,并据壹家堡的地层关系认为,以郑家坡遗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的上限年代早不过殷墟二期^[21],这种认识为一些学者所认同^[22]。

另一说认为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只是并行关系^[23],但对先周文化的时代上限有一些分歧。或认为早到殷墟文化一期左右,其

上限可能早到二里冈上层时期^[24];或认为可早到二里岗下层时期^[25];或认为早于殷墟文化一期,至晚在殷墟文化一、二期时两者并行,但并不认可郑家坡类遗存的性质为先周文化^[26]。笔者赞同郑家坡类遗存为先周文化的认识^[27],其时代上限可早到殷墟一期或略早,限于篇幅不作讨论。

实际上,后来一些持前一说的研究者认识到郑家坡类遗存的年代上限不会太晚(明显要早于殷墟三期),所以将邹衡先生最初所判定的郑家坡遗存的年代上限提早到了殷墟二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际,又认为京当类型的时代下限延续到殷墟二期^[28],这实际上认可两者有一段并行的时期。既然如此,两种遗存必然是并存而不是前后相继的关系。

从空间关系看,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有相当部分重合,这是研究者公认的。据张天恩先生统计^[29],京当类型的遗址有岐山县的岐阳堡、京当、王家嘴、贺家、扶风县的齐家村、白家窑、壹家堡、法门镇,武功县柴家嘴,周至县豆村,户县黄堆,礼泉县朱马嘴,长安羊元坊等,即京当类型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地区。笔者分析认为,除了柴家嘴可能是先周文化遗址外,京当类型的遗址在空间上的总体分布,明显可分三组,第一组最西,分布于周原南北一线,从北向南依次为周原遗址群(岐阳堡、京当、王家嘴、贺家、齐家村)、法门镇、白家窑、壹家堡,西邻刘家文化;第二组偏北,有朱马咀,北临先周文化孙家类型,西北方向不远为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分布区,这两组位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分布区的外围边缘;剩下的一组有豆村、黄堆、羊元坊,大致位于第一、二组构成的文化圈内的东南部。在周原以东的漆水河流域,先周文化遗址的地点明显较多。总体来看,京当类型与先周文化的遗址在空间上存在交错分布的特点(图一),前者的分布区并未与中心地区商文化完全连成片,边缘地带的遗址也呈据点式分布。

按照以往对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历史认知,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应该是成片的,对所在空间

是独占和排他性的,像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的特点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历史认知。但是,有充足证据和研究证明,在考古学文化层面,这两个文化在同一个空间上同时并存是一种事实存在。两者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特点在很长时期令研究者迷茫。这种情形到底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分布态势,需要对京当类型的形成作具体分析,再将其放在商王朝兴衰的动态背景下进行探讨。

二、京当类型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

如果以商代社会和历史为视角,京当类型无疑是商王朝势力西进到陕西关中西部后,在物质文化上呈现的新的文化形态。京当类型既然属于商文化,其文化构成必然有商文化因素;作为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同时也少不了其他文化因素。所以,探讨京当类型商文化的形成,必须要从文化内部判别构成京当类型的商文化的因素、其他各类文化因素及其关系,同时还要分析京当类型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商王朝兴衰的历史为背景,在对内、外两个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或可对京当类型形成的背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总体来看,已知京当类型商文化不论遗迹还是遗物都很丰富,据此可分析其文化构成,判别其中不同的文化因素。实践证明,就汉代以前的物质文化看,考古学文化间的区别、文化关系的亲疏更多地通过文化遗物尤其是当时人群使用的生活器具(又以各类容器类器具最重要)表现出来,据此可确定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探讨考古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源流,而且往往把一种文化的主导文化因素作为此类研究的首选对象。而遗迹及其特征往往用以研究生活环境和社会等级,如果以之作为探讨考古学文化性质、考古学文化关系和文化源流的主要依据,恐怕首先连考古学文化本身都无法确定,更遑论文化性质等问题了。因为在相同或相似地理环境下,少有甚至没有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间,这类因素多有相同或相似者^[30]。

如同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京当类型的各类材质的生活器具尤其是陶器最丰富,种类较多,

形态多样,所以它们被研究者经常用于判别和分析京当类型文化构成的首选对象。如前文所见,已发现的京当类型遗址并不是很多,好在发掘者大多对它们作了文化因素的分析,这使我们考察京当类型的形成有了可靠的基础。

孙华先生最早对壹家堡的商文化构成作了考察,据他对壹家堡第一期商文化的分析可知,其中商文化因素和混合因素占58%,郑家坡类文化因素占40%,两类之和已接近98%,其他因素很少;第二期中商文化因素和混合因素加起来不过40%,而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已达55%^[31]。由于壹家堡商文化遗存不是太丰富,所以对第二期的文化性质曾有不同认识,如果联系商代晚期的政治形势,其属于商文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朱马嘴遗址的商代遗存比较丰富,张天恩先生作了详尽的分析,可知其中明确的文化因素构成主要有六类(表一)^[32]。

表一 朱马嘴遗址商代遗存各类文化因素所占百分比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F类	其他
第一期	65	32	1.2	1		0.2	1
第二期	53	31	1	4	10	0.4	4
第三期	37	35.6	0.5	3	18		6

其中A类为商文化因素,B类为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这是其中最常见的因素。其他文化因素中,除了先周文化孙家类型(E类)相对较多外,源自刘家文化(D类)、内蒙古与晋陕高原青铜文化(C类)、淳化黑头嘴类遗存(F类)的因素虽然存在,但很少。

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的第一期为商文化遗存,据雷兴山先生分析,其中第1段的主要因素也为商文化因素和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但前者所占比例远高于后者,超过50%;第2段时两类因素均为40%稍强,但前者稍多于后者^[33]。据付仲杨兄分析,老堡子地点的情况也类似于朱马嘴和王家嘴^[34]。

此外,西安羊元坊遗址^[35]的信息也类似于上述遗址,其中除商文化因素外,基本为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

对于上述有关遗址所作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者的分析方法相同。虽然对构成各类因素的

器类判别及其分合略有差异,但有关遗址的分析结果大同小异,结论基本一致,说明分析结果是可信的,这为进一步研究京当类型的文化构成特点提供了重要基础。

综合以上遗址信息可知,经过发掘的京当类型遗址的文化构成大致类似,其中以商文化因素为主或比较突出外,居于次要地位的总是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除了这两种因素,局部地点的孙家类型先周文化因素略多外,其他因素则明显较少。京当类型遗址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商文化因素在逐渐减少,但先周文化因素一直比较稳定,甚至不降反增,所占比例明显较多,这种情况颇不寻常,引人注目。上述几处遗址处于京当类型分布区的边缘,由此推知在这个范围内,整个京当类型的文化构成特点当与这些遗址类似,至少不会相差太远。

同样,如果再结合京当类型与相邻或邻近文化的空间分布态势分析,京当类型中那些比例较少的外来文化因素,无疑源自与京当类型相邻或临近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是受相邻或邻近其他文化影响而成的。其中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当然来自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36],因为除了郑家坡类型分布区,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这种文化形态。而且,对包括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在内的关中本土文化的研究明确支持这种认识。

20世纪80年代,随着在关中西部的一些本土文化遗址郑家坡、刘家和碾子坡等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很多文章对这些遗存及其关系作了讨论,但研究者的认识还是有较大差异,尤其对郑家坡遗存的认知分歧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考古系分别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合作,于1992年发掘了武功岸底^[37]、麟游蔡家河^[38]、园子坪^[39]和史家塬^[40]遗址。这几处遗址的商时期遗存各自相对单纯,考古学文化性质容易判断,其中岸底和史家塬遗存的文化属性与郑家坡相同,蔡家河与园子坪则同于碾子坡遗址。笔者曾对与郑家坡先周遗存相同的岸底遗存的文化构成因素作过分析^[41],在所有七类文化因素中,其中第一类因素与朱马嘴B类大致相同,以联裆鬲、联裆甗为核心^[42],数量占绝对优势,其他第二至七类因素则很少^[43],自殷墟二期偏早(或早到殷墟一期偏晚)直到商末周初的四

个期别中,各期文化因素始终以第一类因素占绝对优势,这为寻找京当类型中先周文化因素的来源提供了明确的对比对象。

如果联系到京当类型与相邻其他文化的关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处在京当类型西部边缘的遗址如壹家堡、王家嘴,其中在京当类型商文化阶段,商文化因素与先周文化因素比例之和占绝对优势,源自相邻的刘家文化^[44]因素明显很少;紧接京当类型之后的都是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遗存^[45],其中除了刘家文化因素为主外,商文化与先周文化因素反倒都大为减少。由此可见,在这三个文化并行的时期,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的关系明显密切,两者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共同进退”特点,它们与刘家文化的关系明显疏远,之间甚至是一种排斥关系。

我们知道,相对于关中地区的本土考古学文化,京当类型是一种外来文化。各地商代考古所见,中心地区典型商文化外围的其他商文化类型,是中心地区典型商文化向外扩张、融合各地本土文化而成的新的类型,京当类型的形成自然不能超出这种模式。因为它是商文化的一个类型,其中商式因素当然是其固有因素,此类以外的其他因素当然不能看作是其固有因素而是外来因素,所以不能把京当类型中商文化因素外的其他文化因素如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风格的因素当作是京当类型的固有因素来看待。在商文化西进关中西部之前,前述京当类型和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分布区一定不会是一片空白地带。联系到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大致重合,前者各期中又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的比例不降反增的情况,如果说在商文化西进关中西部之前,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本来就分布于关中西部偏东地区,商人的力量推进到这一带而形成京当类型后,于是其中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这种推测恐怕是合理的,至少不会偏离太远。

所以,京当类型形成的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商王朝势力占领了关中东部后,从西安一线继续向关中西部推进,压制并臣服周人的力量,占领了周人的势力范围后的结果。由于商人的力量有限,它同历史上的很多势力一样,首先占领的

是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城邑、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等。在这个新占领地区,由于商人的势力支撑据点较少,才使商文化京当类型在物质文化上表现为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先周文化因素这一鲜明特点。从京当类型的商文化遗址大多处于外围边缘,少数或散处于内部的态势看,京当类型边缘的这些遗址在当时就是攻、守兼备的据点。商人本是想以这里为基础继续向外扩张的,但由于力量不足,商人的势力也再无力西进,最终止步于此,从而与刘家文化的族群在西边大致对峙于周原南北一线,在北面也大致停留在泾河附近的朱马嘴一带。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商人的势力在这一带只维持到殷墟二期早段,在商王朝全面衰败而从周边各地大退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退出关中西部偏东地区这个原本属于周人的势力范围,此后,本地以周人为主体的族群才得以兴起。所以,就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来说,尽管迄今没有发现比京当类型时代更早的先周文化遗存,但前者中始终存在相当数量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因素说明,这一带的先周文化时代上限不会以京当类型的时代上限为限也是很合理的推测,只是需要今后做更多考古工作予以探寻。那些经过发掘的典型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遗址如郑家坡、岸底遗址,其中商文化因素很少,反过来说明它们在当时都是普通邑聚,还不是周人的高等级的聚落,更不会都是周人都邑所在,这对今后寻找先周时期的周人都邑或许有些启发。

现在,我们再来看京当类型与先周文化“共享”同一个空间的格局,也就容易理解了。京当类型与郑家坡先周文化之间的这种空间格局,虽然曾一度令研究者普遍感到疑惑,至今还有研究者无法理解,这是有关发现仍然较少、研究不够深入所致,需要在京当类型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作进一步分析。

正如上文所说,像京当类型的与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交错分布的特点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历史认知。尽管如此,在考古学文化的层面,它是一种事实存在。如果再上升到国和族文化的层面,将其放在整个商文化的分布格局下作综合考察^[46],就会容易理解。就整个商文化的面貌来说,中心区域的商文化无疑是最典型的;之外围绕中心区域的第二圈区域虽然仍然以商式因素

为主,但已出现差异,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最外圈的区域,文化形态与典型商文化区别更明显,有的地区的文化类型的分布区域或连片,有的或呈据点式分布。像京当类型这种呈据点式分布的情形并非普遍现象,它是一种特殊形态,这种现象基本出现在商文化的边缘地带。如果再上升到商王朝向外扩张、商与周边各种力量的关系背景下考察,如前文所说,京当类型的那些遗址就是商人势力自东向西扩张而留下的一个个商人的据点,在商人这些最外围据点之内的所有区域,都属于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惟在商王朝的西面,商王朝势力多次不断向外扩张而进入其他族群(异族)的势力范围,但在一些地方因为没有力量和时间将后者彻底融合或同化,因而使异族的物质文化传统得以保留,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商文化的特点;商王朝势力退宿后,这些地方的族群随之兴起,各自文化传统得以复兴,这些在物质文化层面会显现出来。

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特殊模式的思考

“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概括性界定,按照以往对这种文化的研究实践,一个考古学文化在空间上虽然可分为中心区和边缘区,但整个文化的分布区应该是统一成片的,对所在空间是独占和排他性的,这可称为考古学文化空间分布的常规模式。上文对京当类型的讨论可知,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还有一种特殊形态,即边缘地区与中心区间不是连成一片的,边缘地区的遗址呈据点式分布,这可称为考古学文化空间分布的特殊模式,这是以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现象。

我们发现,像京当类型在空间分布和物质文化上所呈现的独特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显然不是个例,这种情形往往出现于一种力量急遽向外扩张到其他族群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如果侵入者的力量很强,时间也有保障,并采取激进的同化方式,新扩张区域原有族群的文化可能会被融合乃至同化。但还有另一种情形,如果侵入者的力量和时间都有限,即使采取激进的同化方式,也难以在短期内将原有族群的文化同化,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仍然会保留原有的文化传统。

考古学文化在空间分布的这种特殊形态 在历史上是经常存在的现象,商代如此,西周也是如此。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势力范围大致以陕西关中地区为限,灭商后急遽占领商王朝的疆域,其中以晚商都城殷墟为核心的原商王畿及其邻近地区,原来殷商文化传统根基深厚,从南自河南焦作、新乡,北到北京的太行山东麓平原,西周文化明显分为两种形态:具有鲜明周人文化传统的西周文化,从考古学文化层面看大多限于殷墟范围内以及少数几个西周封国如卫、邢、燕的都邑(如鹤壁辛村、邢台、北京琉璃河)和少数大中型遗址,同时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殷商文化传统因素,这种文化形态分布范围不能连成片,而是呈据点式分布。在这些中心性遗址地点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西周文化,在考古学文化层面普遍呈现出浓厚的殷商文化传统^[47],生活用器、墓葬随葬品大多是从殷商文化延续而来的风格,反倒典型周式风格器物的数量普遍少甚至很少,豫北冀南地区的一些遗址如殷墟外围的西高平^[48]、温县陈家沟^[49]、邯郸龟台寺^[50]等所见,这一地区的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殷墟外围的西周遗址所见,这种殷墟商文化传统在整个西周时期一直强烈地延续着,到春秋早期时可能被入侵的少数民族(狄人)打断,春秋中期时为晋文化彻底替代^[51]。在北京一带,西周封国燕国附近不仅有原殷商人群(物质文化传统明显为原殷商文化形态),在此圈之外还被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族群包围,经过长达百年的力量准备,燕文化随燕国势力才逐步向外扩展,深入张家园上层类型的核心地区^[52]。后代也有这种情况,如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其势力最先占领的是中心性城邑、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这些地点的汉文化中最先出现明显的少数民族印记,而在这些地点以外的广大地区,更多的是汉文化及其传统。即便过了一百甚至二百多年,直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灭亡,他们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汉文化传统,反倒接受了汉文化。

所以,像京当类型这种具有独特空间分布模式的考古学文化形态,它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文化现象,由此使我们思考,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空间形态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只有一种模式,需要在考古工作和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背景作具体考察,并对其形成和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多

元、全方位的思考和认识。

- [1] a. 邹衡. 试论夏文化[C]//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28. b. 邹衡. 论先周文化[C]//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333 - 335.
- [2] a. 王光永. 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J]. 文物, 1977(12). b. 罗西章. 扶风美阳发现商周铜器[J]. 文物, 1978(10).
- [3] 罗西章. 扶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物[J]. 文物, 1977(12).
- [4]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 陕西耀县北村遗址 1984 年发掘报告[C]//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5] a. 北京大学考古系.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3(1). b.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 1986 年度发掘报告[C]//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6] a. 刘士莪, 宋新潮.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J]. 文物, 1988(6). b. 宋新潮. 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西北大学学报, 1987(1). c. 刘士莪. 老牛坡[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7]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4(7).
- [8]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 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 1984(7).
- [9] a. 胡谦盈. 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C]//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6.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C]//考古学集刊(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郊州碾子坡[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10] 徐天进. 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C]//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232.
- [11] 孙华.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的关系[C]//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12] a. 梁星彭. 壹家堡商周遗存若干问题商榷[J]. 考古, 1996(1). b. 高西省. 关中西部出土商代铜器及相关问题——兼论益家堡一期的文化性质[C]//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a.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0(5). b. 张天恩. 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J]. 考古学报, 2004(1). c. 张天恩. 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4] 王占奎, 孙秉君. 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先周文化分期专题初步报告[M]. 引自雷兴山. 周原遗址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注 42 [C]//古代文明(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15] a. 周原考古队. 2001 年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 发掘简报[C]//古代文明(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b. 雷兴山. 周原遗址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C]//古代文明(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c. 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

-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94.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原考古队. 2004 年秋季周原老堡子遗址发掘报告[C]//考古学集刊(17).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17]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第三篇之“商文化的年代、分期与类型”[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8] 同[1]b: 335.
- [19] 邹衡. 再论先周文化[C]//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 264. 后收入: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20]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9(6).
- [21] 同[4].
- [22] a. 王巍, 徐良高. 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J]. 考古学报, 2000(3). b. 宋江宁. 商文化京当类型与郑家坡类遗存关系探讨[C]//三代考古(三).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23] a. 张天恩. 先周文化早期相关问题浅议[C]//西周史研究论文集.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b. 刘军社. 郑家坡文化与刘家文化的分期及其性质[J]. 考古学报, 1994(1). c. 张忠培, 朱延平, 乔梁.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 [24] a. 同[23]a. b. 同[13]c: 275.
- [25] a. 同[23]b. b. 刘军社. 再论郑家坡遗址的分期与年代[J]. 考古与文物, 1996(2). c. 刘军社. 先周文化研究[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3: 64.
- [26] a. 同[15]c: 296-299. b. 雷兴山. 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与先周文化关系辨析[C]//古代文明(7).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 [27] a. 牛世山. 陕西武功县岸底商代遗存分析[C]//考古求知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b. 牛世山. 先周文化探索[J]. 文物季刊, 1998(2).
- [28] a. 徐良高. 京当类型商文化与郑家坡类遗存关系再检讨[J]. 考古, 2010(9). b. 同[22]b.
- [29] 同[13]c: 32.
- [30] 牛世山. 论先周文化的渊源[J]. 考古与文物, 2000(2).
- [31] 同[11].
- [32] 同[13]c: 65 表二.
- [33] 同[15]c: 159.
- [34] 付仲杨. 老堡子遗址商代遗存的年代与性质研究[C]//考古学集刊(17).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J]. 考古与文物, 2003(2).
- [36] 孙华先生首次在《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中就壹家堡第二组因素与郑家坡类遗存的关联关系作了分析, 此后一些学者对类似因素的认识与之类似. 此类文章较多, 不具引.
- [37]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93(8). b. 同[27]a.
- [38] a. 北京大学考古系,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J]. 中原文物, 2000(1). b. 雷兴山. 园子坪、蔡家河等遗址的试掘与碾子坡类遗存分析[C]//考古学研究(四).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39] 同[38]b.
- [4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2004(4).
- [41] 同[27]a.
- [42] 同[27]a: 图一 附表五.
- [43] 同[27]a: 图二 附表五.
- [44] 刘家文化是根据扶风刘家墓葬命名的一支文化. 起初研究者普遍将陕西关中西部商代本土文化除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遗存之外的其他主要遗存如长武碾子坡、宝鸡石嘴头、晁峪等的归属定性为同一种考古学文化, 其间或有一定差异, 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后来一些研究者认为碾子坡类型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族属, 现在普遍认为周原及其以西宝鸡地区包括刘家、石嘴头、晁峪等类遗存的族属为姜姓羌人, 但对泾河上游的碾子坡类遗存的族属认定不尽相同, 有羌人、周人、密须国、阮人等说. 有关讨论和分歧参见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刘军社《先周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 2003)和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 2010). 笔者也曾对有关遗存作过讨论, 认同这些遗存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其族属为羌人, 可能是殷墟甲骨刻辞记载的羌方(刘家文化的初步研究[C]//远望集.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商代的羌方[C]//三代考古(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45] 同[15]c: 244.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47] 参见: 柴晓明. 华北西周陶器初论[C]//青果集.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段宏振, 张翠莲. 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C]//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知识出版社, 1996. 刘绪. 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C]//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徐良高. 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C]//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第二、三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豆海峰. 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分期研究[J]. 华夏考古, 2013(2). 豆海峰. 太行山东麓西周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2006(4).
- [4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温县陈家沟遗址发现的西周墓[J]. 华夏考古, 2007(2).
- [50] 北京大学, 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 1957 年邯郸发掘简报[J]. 考古, 1959(10).
- [51] 牛世山. 西周时期的殷墟与周边: 文化的革新与传承——附论有关殷墟的若干问题[J]. 考古, 待刊.
- [52] 李伯谦. 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C]//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李自智)